

金融危机对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王德文 张展新 程杰 侯慧丽

内容提要: 全球金融危机对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了就业冲击。尽管贫困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目前基本都已外出,但面临着就业不稳定和工资收入下降等问题。由于务工收入是贫困地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就业不稳定和工资收入下降将增加贫困地区农户的返贫风险和脱贫难度。沿海地区产业升级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上升以及就业不稳定性增加等新变化对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的培训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从政策思路来看,解决好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培训工作中的突出问题,不仅可以积极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就业冲击,而且可以为贫困地区减少贫困创造有利条件。

关键词: 全球金融危机 农村劳动力转移 培训 贫困地区

2008年底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和劳动力就业产生了巨大冲击,就业形势由过去的宽松状态转为紧张状态,减少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机会,造成了沿海开放城市和地区大批农民工提前返乡。在不利的的外部环境和就业冲击下,贫困地区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面临着新问题和新的挑战。

在沿海地区劳动力需求疲软的情况下,做好劳动力转移工作,是摆在贫困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面前的一项重任。本文着重考察全球金融危机对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及其对策思路。全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就业冲击的总体状况,并对贫困地区和非贫困地区农村外出劳动力的就业和收入状况进行对比;第二部分利用调研资料,分析金融危机对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收入的影响;第三部分讨论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培训工作中的突出问题;第四部分提出政策思路。

一、金融危机的就业冲击

(一) 全国总体状况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08年10月统计,返乡农民工数量约为485万,占外出务工人员的5.4%^①。随着时间推移,返乡农民工数量不断增加。2009年1月,农业部对15个省、150个村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②,春节前返乡的农民工比例为38.5%,其中有39.6%属于失去工作或者未找到工作的返乡劳动力。也就是讲,相当于外出总量15.3%的农民工提前返乡,大约有2000多万农民工因金

*本文获得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村庄调研课题的资助,特此致谢!

^①数据来源:《全国1.3亿外出农民工中已有780万人提前返乡》,中国人口信息网(<http://www.cpic.org.cn>),2008年12月18日。

^②数据来源:陈锡文:《中国约2000万农民工失业》,路透中文网(<http://cn.reuters.com>),2009年2月2日。

融危机冲击或经济不景气而失去工作岗位。

国家统计局 2009 年 1 月统计显示,截至 2008 年年底,全国农民工总量为 22542 万人。其中,外出就业数量为 14041 万人,占 62.3%;本地就业数量为 8501 万人,占 37.7%。春节前返乡农民工约占外出农民工数量的 50%。在返乡的 7000 万农民工中,大约 80%以上的农民工选择再次进城务工,近 20%的农民工就地就业或创业或寻找工作。在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中,有 4500 万人已找到工作,有 1100 万人处于寻找工作的状态^①。

全球金融危机对农民工的就业冲击有四个特点^②:①农民工提前返乡,时间主要集中在 2008 年第四季度,这一时期返乡人数占全年返乡人数的 70.7%;②提前返乡农民工主要来自东部沿海地区,东部地区返乡农民工占全部返乡农民工的比例为 62.4%,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只有 16.1%和 21.5%;③制造业和建筑业遭受的冲击最为严重,这两个行业的农民工返乡人数占返乡总人数的比例分别为 36.1%、28.2%,占这两个行业农民工就业人数的比例分别为 46.2%和 73.3%;④返乡农民工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为主,占返乡农民工数量的 82.9%。

(二) 贫困县与非贫困县的对比

2009 年上半年,农业部对 31 个省(区、市)近 2 万个农村固定观察点的农户进行了专题调查。在固定观察点所在的县中,58 个县属于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以下简称“贫困县”),占全国贫困县的 9.8%。利用这套资料,本文比较了全球金融危机对贫困县和非贫困县农户外出劳动力就业、收入等方面的影响。

从总量上看,2009 年 1~5 月,全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数量为 1.38 亿人,比上年同期增加了 213 万人,增长了 1.6%,但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了 4.2 个百分点。农村劳动力外出数量保持增长,原因在于:一方面,在国家出台的经济刺激措施作用下,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趋稳并有所恢复,带来了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另一方面,农民工以青年为主,属于新一代群体,他们不熟悉农业生产,向往城市生活,并期望今后在城市扎根,继续外出就成为他们的首选。

如表 1 所示,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累积天数有所减少。2009 年 1~5 月,外出累积就业天数为 126.1 天,比上年同期减少了 6.5 天。其中,女性比男性多减少了 1.5 天,低年龄组减少的天数多于高年龄组,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减少天数较多。分地区看,贫困县劳动力外出累积就业天数在两年中都少于非贫困县,这意味着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外出挣得的收入相对较低。从累积就业天数的减少情况看,贫困县减少天数大于非贫困县,而且分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比较结果也是如此。伴随着累积就业天数减少,如果工资收入也出现下降,那么,贫困地区农户收入增长受到的冲击则更大。

	2008 年 1~5 月			2009 年 1~5 月		
	非贫困县	贫困县	合计	非贫困县	贫困县	合计
所有劳动力	133.2	130.6	132.6	126.9	122.6	126.1
男性	132.5	129.3	131.8	126.7	121.9	125.7
女性	134.4	133.2	134.2	127.2	123.8	126.6

^①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08 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为 22542 万人》,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www.stats.gov.cn>), 2009 年 3 月 25 日。

^②参见国家统计局:《2008 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为 22542 万人》,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www.stats.gov.cn>), 2009 年 3 月 25 日。

(续表 1)

按年龄分						
16~24 岁	133.1	131.0	132.6	125.6	122.2	124.8
25~34 岁	134.7	131.0	134.0	128.3	123.4	127.4
35~44 岁	132.0	131.7	131.9	126.6	122.9	125.8
45 岁及以上	130.8	126.1	130.1	125.9	120.8	125.0
按受教育程度分						
小学及以下	131.2	128.6	130.4	125.8	120.9	124.5
初中	132.9	130.7	132.5	126.1	123.0	125.5
高中中专	135.4	133.7	135.1	128.7	122.9	127.9
大专及以上学历	137.7	138.9	137.8	132.8	123.9	131.5

资料来源：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农村固定观察点。

从表 2 来看,与 2008 年同期相比,2009 年 1~5 月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现金收入下降了 2.8%。由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出口企业在订单减少或消失的情况下,通过停产或减产等方式加以应对,就业岗位、工作时间和工资水平也相应调整,以降低劳动力成本,渡过困难时期。这是企业对外部冲击的正常反应,也是劳动力市场机制起作用的表现,但如果贫困地区外出劳动力的工资收入下降,那么,这极有可能加大农户的返贫风险。不过,从表 2 来看,贫困县外出劳动力的现金收入并未出现下降,而外出劳动力总体的现金收入下降主要来自非贫困地区。

表 2 2008 年与 2009 年农民工人均现金收入对比 单位:元

	2008 年 1~5 月			2009 年 1~5 月		
	非贫困县	贫困县	合计	非贫困县	贫困县	合计
所有劳动力	6087	4687	5795	5826	4836	5632
男性	6698	5107	6358	6372	5154	6126
女性	4991	3848	4764	4927	4255	4802
按年龄分						
16~24 岁	5074	4196	4882	4878	4102	4699
25~34 岁	6406	4718	6058	6029	4877	5832
35~44 岁	6666	5185	6322	6593	5571	6374
45 岁及以上	6449	4915	6206	5897	5275	5791
按受教育程度分						
小学及以下	5675	4325	5287	5135	4116	4867
初中	5896	4685	5655	5658	4800	5490
高中中专	6764	5059	6462	6230	5580	6133
大专及以上学历	8261	7643	8203	8069	6828	7894

资料来源：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农村固定观察点。

二、贫困地区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收入：两个案例分析

为了更深入细致地分析金融危机对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笔者选择了两个劳务输出大省,即安徽省和重庆市,在这两个省(市)中分别选取了 1 个贫困县进行调研。其中,在安徽省

选择了枞阳县，在重庆市选择了开县。

这两个贫困县都属于人口大县和农业大县。其中，枞阳县人口 97 万，农村劳动力资源为 44 万人；开县人口 158 万，农村劳动力资源为 79 万人。两县均呈现人多地少的特征。开县人均耕地面积为 0.76 亩，枞阳县人均耕地面积为 0.99 亩。两县的农业产值比重高于两省（市）和全国平均水平，与全国贫困县平均的就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具有相似性。

2007 年，枞阳县和开县的人均 GDP 分别为 7127 元和 7923 元，低于对应的省（市）以及全国平均水平，但略高于全国贫困县的平均水平。两县第一产业产值的比重分别为 26.5% 和 25.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5 个百分点，第二、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由于人多地少，再加上第二、第三产业不发达，两县大量农村劳动力需要通过转移就业来增加收入和摆脱贫困。

相比而言，开县的贫困程度高于枞阳县。2006 年，枞阳县贫困发生率为 3.3%，低于当年全国贫困发生率 3 个百分点。2007 年，开县贫困发生率为 8.2%，高于当年全国贫困发生率 3.2 个百分点。2007 年，枞阳县和开县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 2948 元和 3210 元，高出全国贫困县平均水平 30%~40%。这在较大程度上得益于工资性收入，枞阳县和开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分别高达 42.1% 和 49.7%，均高于全国贫困县平均水平（34.4%），同时也高于全国总体水平（38.6%），劳动力转移对这两个贫困县的农民收入具有重要影响。

（一）劳动力转移与就业

枞阳县和开县都是劳务输出大县。其中，枞阳县的转移劳动力数量达 24 万人，占全县劳动力总量的 54.8%；被称为“打工第一县”的开县，转移劳动力数量高达 47 万人，占全县劳动力总量的 59.4%。两县农村劳动力转移比例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2%）。据当地反映，目前两县可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已不多。2006 年，开县已经成功转移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 92%，未转移的仅有 3 万人。2008 年，枞阳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仅有 0.3 万人左右。枞阳县的农村劳动力主要输往“长三角”地区，约占 70%；开县的农村劳动力主要输往“珠三角”地区，约占 60%。建筑、电子、服装制造和餐饮服务等是这两县转移劳动力主要从事的行业。

劳务经济成为贫困县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枞阳县和开县的劳务经济总量分别达 20 亿元^①和 24 亿元^②，平均为两县农民人均创收 2320 元和 1696 元^③。劳动力转移对于贫困地区农民增收、脱贫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全球金融危机对这两县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务工收入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到 2009 年 5 月，两县未外出的农民工数量已不多。据枞阳县调研资料，截至 2009 年 1 月 19 日，全县共返乡农民工 16.3 万人，占外出务工总人数的 67.1%。到 2009 年 4 月底，返乡农民工再次实现转移就业累计人数达 15.5 万人，滞留在家和二次返乡的农民工约 7300 人，仅占外出务工人员总数的 3.0%。在滞留人员中，有 2100 人在家从事种植养殖，2700 人实现就近转移就业，75 人在家乡创业，410 人参加培训，只有 1940 人没有实现转移就业，仅占农民工总量的 0.8%（见表 3）。

开县返乡农民工的滞留情况也有好转。开县未外出农民工数量约为 2.8 万人，占常年外出务工人员总数的 5.8%。2008 年 12 月~2009 年 4 月，1.5 万名返乡农民工实现了本地就业，5000 人实现了外出转移就业，500 人自主创业，1000 人成为个体工商户，即 76.3% 的返乡农民工实现了再就业^④。

^①数据来源：《枞阳县年创劳务收入 20 亿元》，枞阳县人民政府网（<http://www.zongyang.gov.cn>），2008 年 8 月 22 日。

^②数据来源：开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开县 200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08 年计划草案的报告》，2008 年 2 月。

^③如果与两县住户调查中的人均工资性收入相比，这两个数字明显偏高，但它们可能包括了在外支出等部分。

^④数据来源：《开县农民工返乡掀创业潮》，《重庆晨报》，2009 年 1 月 19 日。

截至 2009 年 5 月, 滞留本地未实现就业的农民工约为 6600 人, 仅占农民工总数的 1.4% (见表 3)。

表 3 金融危机对贫困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影响

	枞阳县	开县
未外出的农民工数量 (人)	7300	28000
占有所有农民工比重 (%)	3.0	5.8
其中, 再就业人数 (人)	5300	21000
未就业人数 (人)	1940	6600
未就业人数占有所有农民工比重 (%)	0.8	1.4

(二) 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从调研情况看, 大量返乡农民工已经外出。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 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稳定性、工资收入等值得关注。如果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稳定性和工资收入下降, 那么, 贫困农户的返贫风险极有可能加剧。

调查结果显示, 进城农民工的就业状况面临一定困难, 工作搜寻时间较长, 仍有部分农民工目前未找到稳定的岗位, 实际劳动时间较常年有所减少。就业不稳定将影响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和务工收入。在枞阳县访谈的 50 个农户中, 有 18 户反映家庭外出务工成员的月工资平均下降 100~300 元, 下降幅度为 5%~20%。在江浙、广东等沿海地区从事劳动密集型行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务工人员, 工资下降更为明显。年龄较大的返乡农民工, 其收入下降同样明显。根据笔者对开县的调查, 在县内实现非农就业的农民工收入水平较外出务工下降了 30%, 而返回县内从事农业的农民工其收入水平较外出务工下降了 80%。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和工资水平下降, 直接影响农民增收和减贫工作。

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和工资水平下降导致农户收入波动加大, 贫困地区农户可能再次陷入贫困状况。贫困地区农民工的整体素质相对较低, 缺乏技能, 抵御金融危机影响的能力较弱, 尤其是刚刚脱贫的低收入农户更容易遭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全国贫困县的全部劳动力中, 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达 56%, 远高于 32% 的全国总体水平。而且, 部分贫困户面临疾病等因素, 加上贫困地区自然灾害发生率高,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 贫困地区农户的返贫风险更大。对两县的调查发现, 在返乡农民工中, 多数是难以承受外地较高生活成本的贫困农户或低收入农户的劳动力, 而且因病返乡、返贫的居多。

三、新形势下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培训工作的突出问题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 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步伐加快, 对熟练劳动力、有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增加, 对低技能或无一技之长的农民工的需求下降。根据笔者对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调研, 到 2009 年 4 月底, 多数农民工实现了就业, 没有找到岗位的不到 10 万人。在广东省打工的农民工中, 具有技能的占 42.4%, 比春节前高出近 9 个百分点, 而无一技之长的农民工就业困难增加。广东省采取了加强农民工技能培训的政策措施, 但主要是面向本省农民工。在广东省 2009 年 400 万农民工培训计划中, 外来农民工只有 100 万, 仅占广东省外来农民工总量的 5%, 而且具有初级以上技能的外省农民工才有资格参加培训。

在经济以出口加工为主的东莞市, 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形势从 2009 年 3 月起较快回升, 4 月底的求人倍率已上升并超过 1, 这似乎表明农民工寻找工作的困难时期已经过去。广东省的就业总量接近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但据部分企业管理人员反映, 目前经济形势好转的基础还不十分稳固, 虽然近期加工出口产品产量回升, 但这可能是企业追加库存造成的, 并不代表国际市场的真正复苏。从

国际经济和金融形势来看,可能存在着新一轮冲击的风险,这意味着农民工的就业形势和收入水平仍具有不确定性。

上述新变化对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的培训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然而,由于投入、方式和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的培训工作存在着以下突出问题:

一是培训资源投入少、效率低。目前,按规定,财政发展资金的10%将用于培训,但该比例偏低。受到其他因素的约束,多数贫困地区实际投入培训的资金占财政发展资金的比例不到10%。由于自身财政困难,贫困地区地方财政配套资金难以落实,再加上培训资源分散到多个部门,缺乏统筹协调,导致资源配置分散,利用效率低下。

二是培训方式单一。劳动力转移培训以引导性培训和短期培训为主,培训期限多数是6个月甚至3个月以下,受训者仅仅是了解简单的操作技能,难以真正形成“一技之长”,不能满足沿海地区用工企业对技术工人的需要。同时,创业培训和实用技术培训明显不足。随着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带来产业结构调整,贫困地区在劳动力创业培训上已经有了一定作为,但在创业培训的理念、方式和机制等方面仍然比较落后。

三是培训质量不高。在多数地区,由政府主导设置培训机构,而且各县都办,但由于不少县(市)缺乏必要的师资、设备和办学条件,严重影响了办学质量。例如,枞阳县仅有3家培训机构开设5种以上工种的培训,其他培训机构规模都很小,培训工种单一,有的培训机构甚至只开设一种工种的培训。对于需求量较大的数控机床、模具制作、铸造等工种,目前培训机构仍然无法开展培训。在条块分割和地方保护下,一些县(市)由于办学质量差,存在培训机构招收不到农民工的现象。然而,一些办学基础较好的地区,因缺乏有效的资源整合,又限制了培训机构的发展。在资源条块切块的情况下,培训市场难以形成有效的竞争,无法改善办学内容和提高办学质量。

四是培训扶持政策瞄准不准确。一方面,贫困农户参与培训的负担较重。当金融危机冲击贫困农户家庭的生存安全时,他们会将更多的时间用于搜寻工作机会,或者接受更低的工资,而不是参加技能培训,这也是贫困地区培训机构招生难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以贫困村为瞄准对象的扶贫政策,通常覆盖了大量的非贫困农户,而实际需要重点扶持的贫困农户可能难以甄别,在此基础上实施的劳动力转移培训扶持政策难以有效覆盖到贫困农户,导致政策实施偏差。

五是管理分散和行政干预强。目前,扶贫、劳动、农业、教育、工会、妇联等部门均有培训任务和规划,但是,培训投入和补贴标准不一致,培训资源难以有效整合。例如,枞阳县扶贫办的“雨露计划”安排50万元用于培训,人均标准为500元。根据该县劳动部门估算,培训一个合格技工的费用至少需要1500元左右,差额为1000元。此外,培训计划主要通过行政下指标的方式执行,无法满足就业培训的需要。例如,“雨露计划”的培训指标为1000人,主要是贫困户中16~45岁的劳动力;“阳光工程”的培训指标仅有500人,主要是18~50岁的农民;两者合计不到2000人,与该县24万的外出劳动力数量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四、结论与政策思路

全球金融危机对贫困地区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了冲击。尽管贫困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都已外出,但面临着就业不稳定和工资收入下降等问题。由于务工收入是贫困地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就业不稳定和工资收入下降将增加他们的返贫风险和脱贫难度。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背景下,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的培训工作面临着新挑战和新问题。从政策思路来看,抓好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是贫困地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关键。这要求加大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力度,

提高培训资源的利用效率,完善培训补贴的瞄准机制,改进培训方式,同时拓宽就业渠道,完善就业服务体系,推动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

第一,加大培训投入,并适当向贫困地区倾斜。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农村劳动力资源数量庞大,而人均培训资源非常少,中央和地方财政新增的劳动力转移培训资源有必要向贫困地区倾斜。由于贫困县的财政大多数是“吃饭财政”,无力进行资金配套,因此,对于贫困地区的培训投入应主要来自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专项资金。在加大投入和整合培训资源的基础上,可将财政发展资金实际用于培训的比例从目前的10%提高到20%~30%。

第二,试点实施“省内统一”的办法,提高培训的质量和效率。扶贫部门可以根据省内劳动力培训的需求状况,率先进行省内培训资源整合的试点,鼓励省内培训机构相互竞争,通过购买“培训订单”等方式,促进优质培训机构发展,优化培训资源地区布局,消除省内的地区分割和体制障碍。在实施上可以采取“培训券”的方式,允许培训对象自由选择省内的培训基地或机构参加培训;或者通过直接公开招标的方式,保证符合条件的培训机构公平竞争,而不是由政府部门直接指定培训机构或分配培训资源。同时,取消原有的县一级认证培训基地或机构的做法,上升为由省一级进行严格的资质认证,以确保培训质量。

第三,完善瞄准机制,实施叠加补贴政策。在瞄准对象上,应该以贫困家庭或贫困人口为目标,重点突出对贫困家庭及其劳动力提供培训扶持。同时,结合劳动力的需求特征实行分类指导。对于缺乏一技之长的外出务工人员,可采取属地化管理,由劳务输入地实施培训;在培训资源安排上,可结合“培训券”或凭培训证书报销等方式,用活培训资源。对于回到家乡、但因家庭困难不能参加培训的农户成员,可考虑把扶贫救济与参与培训结合起来,实行有条件扶贫;对于有一定技能、但需要再培训的外出农民工,可鼓励他们参加职业技术再培训,输入地则通过扶贫培训协作的方式承担一定的培训责任。扶贫部门在确定贫困对象的基础上,实施叠加补贴政策,将扶贫、劳动和社会保障以及教育等部门的培训补贴给予帮扶对象,解决人均培训投入不足的问题。

第四,改进培训方式,丰富培训内容。在培训时间上,逐步从短期培训向中长期培训延伸,通过丰富培训内容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首先,根据市场需求及农民工自身的特点,加强职业学校与农业、劳动和社会保障、扶贫等部门的密切配合,丰富创业培训和实用技术培训的内容,使接受培训的人员掌握1~2门就业技能。其次,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开展创业培训。在政策上,可以采取创业培训与创业扶持政策相结合的方法,让接受培训的农户在获取创业贷款、经营税收等方面有相应的优惠待遇。再次,积极开展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充分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和远程教育等手段,把职业培训与农业技术推广、科技开发、扶贫开发等紧密结合起来,努力培训出一批“有知识、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农民。

第五,拓宽就业渠道,完善就业服务。在不利的就业形势下,国家刺激经济计划要把就业因素纳入考虑,通过发挥政府投资拉动社会投资的积极作用,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中西部地区和贫困地区要抓住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机会,积极创造承接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条件,吸纳返乡农民工在本地实现非农就业。贫困地区要把扶贫开发与就业创造相结合,通过实施“整村推进”计划,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新农村建设有机联系起来,创造本地的非农就业机会。在产业化扶贫工作中,把对龙头企业的项目贴息贷款、对专业合作社组织的财政扶持与带动农户就业挂钩。同时,加强县、乡镇、村、村民小组四级就业服务网络建设,加强劳务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的合作,进一步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引导贫困地区劳动力有序输出。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责任编辑:黄慧芬)